

复印报刊资料

《文艺争鸣》丛刊

王蒙小说创新资料

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文艺学会筹备委员会 编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

1980年 北京

王蒙小说创新资料

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文艺学会筹备委员会 编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

出 版 说 明

王蒙同志近年来在小说创作中“标新立异，另辟蹊径，花样翻新”（王蒙：《短篇小说创作三题》），进行了广泛和大胆的艺术探索。除了运用传统的小说写法外，他还运用了“意识流”的手法、鲁迅的杂文手法和李商隐的象征手法，在读者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和热烈的争论。为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编辑了这本资料，可供文艺创作和评论工作者、文艺爱好者研究参考。

我们将以丛刊形式继续编辑这种资料，选收有关作品和评论这些作品的不同观点的文章，故定名曰：《文艺争鸣》。

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文艺学会筹备委员会

1980年10月

目 录

王 蒙 小 说 作 品 选

夜的眼·····	(1)
布 礼·····	(7)
春之声·····	(43)
风筝飘带·····	(51)
海的梦·····	(61)
蝴 蝶·····	(69)

王 蒙 谈 小 说 创 作

我在寻找什么? ·····	(103)
短篇小说创作三题·····	(107)
对一些文学观念的探讨·····	(111)
关于“意识流”的通信·····	(114)
关于《春之声》的通信·····	(117)

王 蒙 作 品 评 论 选

王蒙的创作和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趋向·····	刘梦溪(121)
创造新的艺术世界 ——试论王蒙近年来的艺术探索·····	方顺景(134)
现实主义和“意识流” ——从两篇小说运用的艺术手法谈起·····	李 陀(139)
“一切景语皆情语” ——读王蒙的短篇小说《春之声》·····	周姬昌(145)
他们象征着未来 ——试析王蒙短篇新作《风筝飘带》·····	何 新(147)

广阔天地任飞翔

——王蒙《风筝飘带》读后……………章仲锬(151)

幻灭者的微末的悲凉

——评《风筝飘带》……………计永佑(152)

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

——王蒙新作《蝴蝶》读后……………陈骏涛(154)

引人注目的探索

——围绕王蒙同志小说创作开展的讨论……………仲呈祥(157)

《北京晚报》关于王蒙小说的讨论

他在吃蜗牛……………刘心武(159)

“复调小说”和“怪味小说”……………刘心武(160)

我失望了！（致王蒙）……………陈俊峰(161)

给王蒙同志的信……………严文井(162)

给严文井同志的回信……………王 蒙(163)

不是失望，是大有希望！……………张维安(163)

什么是“意识流”？……………何 新(164)

“失望”为时过早……………袁良骏(165)

要创新，但别脱离群众……………罗天平(166)

曲高和寡对谁弹？（评王蒙的近作）……………王志宇(167)

王蒙的“魂儿”（读《蝴蝶》后想到的）……………钟 惟(168)

要创新，开始要脱离一部分群众……………沈志明(169)

问号上的问号（谈“读者群”）……………李 陀(170)

争鸣赞……………曹菲亚(171)

窝头就蜗牛，再加二两油！……………王 蒙(172)

王蒙主要近作发表情况……………（6）



路灯当然是一下子就全亮了的。但是陈果总觉得是从他的头顶抛出去两道光流。街道两端，光河看不到头。槐树留下了朴质而又丰满的影子。等候公共汽车的人们也在人行道上放下了自己的浓的和淡的各人不止一个的影子。

大汽车和小汽车。无轨电车和自行车。鸣笛声和说笑声。大城市的夜晚才最有大城市的活力和特点。开始有了稀稀落落的、然而引人注目的霓虹灯和理发馆门前的旋转花浪。有烫了的头发和留了的长发。高跟鞋和半高跟鞋，无袖套头的裙衫。花露水和雪花膏的气味。城市和女人刚刚开始略略打扮一下自己，已经有人坐不住了。这很有趣。陈果已经有二十多年不到这个大城市来了。二十多年，他呆在一个边远的省份的一个边远的小镇，那里的路灯有三分之一是不亮的，灯泡健全的那三分之二又有三分之一的夜晚得不到供电。不知是由于遗忘还是由于燃料调配失调。但问题不大，因为那里的人大致上也是按照农村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古制而生活的，下午六

点一过，所有的机关、工厂、商店、会堂就都下了班了。人们晚上都呆在自己的家里抱孩子，抽烟，洗衣服，说一些说了就忘的话。

汽车来了，蓝色的，车身是那种挂连式的，很长。售票员向着扩音器说话。人们挤挤涌涌地下了车。陈果和另一些人挤挤涌涌地上了车。很挤，没有坐位，但是令人愉快。售票员是个脸儿红扑扑的、口齿伶俐而且嗓音响亮的小姑娘。在陈果的边远的小镇，这样的姑娘不被选到文工团去报幕才怪。她熟练地一掀电门，遮着罩子的供看票用的小灯亮了，撕掉几张票以后，叭，又灭了。许多的街灯、树影、建筑物和行人掠过去了，又要到站了，清脆的嗓子报着站名，叭，罩灯又亮了，人们又在挤挤操操。

上来两个工人装束的青年，两个人情绪激动地在谈论着：“……关键在于民主，民主，民主……”。来大城市一周，陈果到处听到人们在谈论民主，在大城市谈论民主就和在那个边远小镇谈论羊腿把子一样普遍。这大概是因为大城市的肉食供应

比较充足吧，人们不必为羊腿操心。这真让人羡慕。陈果微笑了。

但是民主与羊腿是不矛盾的。没有民主，到了嘴边的羊腿也会被人夺走。而不能帮助边远的小镇的人们得到更多、更肥美的羊腿的民主则只是奢侈的空谈。陈果到这个城市来是参加座谈会的，座谈会的题目被规定为短篇小说和戏剧的创作。粉碎“四人帮”后，陈果接连发表了五、六篇小说，有些人夸他写得更成熟了，路子更宽了，更多的人说他还没有恢复到二十余年前的水平。过份注意羊腿的人小说技巧就会退化的，但是懂得了羊腿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却是一大进步和一大收获。这次应邀来开会，火车在一个小站上停留了一小时另十二分钟，因为那里有一个没有户口而有羊腿、卖高价的人被轧死了；那人为了早一点把羊腿卖出去，竟然不顾死活地在停下来的列车下面钻行，结果，制动闸失灵，列车滑动了那么一点点，可怜人就完了。这一直使陈果觉得沉重。

正象从前在这样的座谈会上他总是年龄最小的

一个一样，现在这一类会上他却是比较年长的了，而且显得土气，皮肤黑、粗糙。比他年轻、肩膀宽、个子高、眼睛大的同志在发言中表达了许多新鲜、大胆、尖锐、活泼的思想。令人顿开茅塞，令人心旷神怡，令人猛醒，令人兴奋。结果文艺问题倒是讨论不起来，尽管主持会议的人拼命想引导大家围绕中心，大家谈得最多的还是关于“四人帮”赖以立足的土壤，关于反封建，关于民主与法制、道德与风气，关于公园里有愈来愈多的青年人聚众跳交谊舞、用电子吉他伴奏，以及公园管理人员如何千方百计地与这种灾祸作斗争；从每隔三分钟放送一次禁止跳这种舞的通告、罚款办法到提前两个小时闭园。陈果也在会上发了言，比起其他人，他的发言是低调门的。“要一点一滴，从我们脚下做起，从我们自己做起。”他说。这个会上的发言如果能有一半，不，五分之一，不，十分之一变为现实，那就简直是不得了！这一点使陈果兴奋，却又惶惑。

车到了终点站，但乘客仍然满满的。大家都很轻松自如，对于售票员的收票验票的呼吁满不在意，售票员的声音里带有点怒气了。象一切外地人一样，陈果早就高举起步手中的全程车票，但售票员却连看他都不看一眼，他规规矩矩地主动把票子送到售票员手里，售票员连接都没接。

他掏出“通讯录”小本本，打开蓝灰色的塑料

皮，查出地址，开始打问。他问一个人却有好几个人向他指点，只有在这点上他觉得这个大城市的人还保留着“好礼”的传统。他道了谢，离开了灯光耀眼的公共汽车终点站，三拐两弯，走进一片迷宫似的新住宅区。

说是迷宫不是因为它复杂，而是因为它简单，六层高的居民楼，每一幢和每一幢都没有区别。密密麻麻的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的阳台，密密麻麻的闪烁着日光灯的青辉和普通灯泡的黄光的窗子。连每一幢楼的窗口里传出来的声音也是差不多的。电视正在播送国际足球比赛，中国队踢进去一个球，球场上的观众和电视荧光屏前面的观众欢呼在一起，人们狂热地喊叫着，掌声和欢呼声象涨起来的海潮，人们熟悉的老体育广播员张之也在拼命喊叫，其实，这个时候的解说是多余的。另外，有的窗口里传出锤子敲打门板的声音，剁菜的声音和孩子之间吵闹和大人的威胁的声音。

这么多声音，灯光，杂物都堆积在象一个一个的火柴匣一样呆立着的楼房里；对于这种密集的生活，陈果觉得有点陌生、不大习惯、甚至有点可笑。和楼房一样高的一棵棵的树影又给这种生活铺上薄薄的一层神秘。在边远的小镇，晚间听到的最多的是狗叫，他熟悉这些狗叫熟悉到这种程度，以致在一片汪汪声中他能分辨哪个声音是出自哪种毛色的哪一只狗和它的主人

是谁。再有就是载重卡车夜间行车的声音，车灯刺激着人的眼睛，车一过，什么都看不见了。临街的房屋都随着汽车的颠簸而震颤。

行走在这迷宫一样的居民楼里，陈果似乎有一点后悔。真不应该离开那一条明亮的大街，不应该离开那个涌涌操操的热闹而愉快的公共汽车，大家一起在大路上前进，这是多么好啊，然而现在呢，他一个人来到这里。要不就呆在招待所，根本不要出来，那就更好，他可以和那些比他年龄小的朋友们整晚整晚地争辩，每个人都争着发表自己的医治林彪和“四人帮”留下的后遗症的处方。他们谈论贝尔格莱德、东京、香港和新加坡。晚饭以后他们还可以买一盘炸虾片和一盘煮花生米，叫上一升啤酒，既消暑又助谈兴。然而现在呢，他莫名其妙地坐了好长时间的车，要按一个莫名其妙的地址去找一个莫名其妙的人办一件莫名其妙的事。其实事一点也不莫名其妙，很正常，很应该，只是他办起来不合适罢了，让他办这件事还不如让他上台跳芭蕾舞，饰演《天鹅湖》中的王子。他走起路来都有一点跛，当然不注意倒也看不出，这是“横扫一切”留下的小小的纪念。

这种倒胃口的感觉使他想起二十多年前离开这个大城市来。那也是一种离了群的悲哀。因为他发表了几篇当时认为太过份而现在又认为太不够的小说，这使他长期在百分之

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间荡秋千，这真是一个危险的游戏。

按照人们所说的，对面不太远的那一幢楼就是了，偏偏赶上这儿在施工，好象在这里还要按装什么管道，不，不止是管道，还有砖瓦木石呢，可能还要盖两间平房，可能是食堂，当然也可能是公共厕所，总之，一道很宽的沟，他大概跳不过去，被横扫以前本来是可以跳过去的，所以他必须找一个桥梁，找一块木板，于是他顺着沟走来走去，焦躁起来，竟没有找到什么木板，白白地多走了冤枉路，绕还是跳？不，还不能服老，于是他后退了几步，一、二、三，不好，一只脚好象陷在沙子里，但已经跳了起来，不是腾空而起，而是落到沟里。幸好，沟底还没有什么硬的或者尖利的东西。但他也过了将近十分钟才从疼痛和恐惧中清醒过来，他笑了，拍打了一下身上的土，一跛一拐地爬了出来，谁知道刚爬出来又一脚踩到一个雨水洼里，他慌忙从水洼里抽出了脚，鞋和袜子已经都湿了，脚感到很牙碜和吃了带土的米饭时嘴的感觉一样。他一抬头，看到楼边的一根歪歪斜斜的杆子上的一个孤另另的、光色显得橙红的小小的电灯泡。这个电灯泡存在在这里，就象在一面大黑板上画了一个小小的问号，或者说是惊叹号也行。

他走近了问号或惊叹号，楼窗里又传出来欢呼混合着打口哨的声音，大

概是外国队又踢进了一个球。他凑近楼口，仔细察看了一下楼口上面的字迹，断定这就是他要找的那个地方。但他不放心，站在楼口等候一个过往的人，好再打听一下。同时怪不好意思。

他临走以前，那个边远的地方的一位他很熟悉也很尊重的领导同志找了他去，交给他一封信，让他去到大城市去找一个什么公司的领导人。“我们是老战友”，当地的陈果所熟悉的领导同志说，“我信上已经写了，咱们机关的唯一的一辆上海牌小卧车坏了，管理人员和驾驶员已经跑了好几个地方，看来本省是修不好的了，缺几个关键性的部件。我这个老战友是主管汽车修配行业的，早就向我打过保票，说是‘修车的事包在我身上’，你去找找他，联系好了拍一个电报来……”

就是这么一件普普通通的事。找一个私人，一个老友，一个有职有权的领导，为另一个有职有权、在当地可以称得上是德高望重的领导所属单位修理一辆属于国家所有的小汽车。没有理由拒绝这位老同志的委托，而懂得羊腿的重要性的陈果也就不对带信找人的必要性发生怀疑。顺便为当地办点事当然是他应尽的义务，但是，接受这个任务以后总觉得好象是穿上了一双不合脚的鞋，或是穿上一条裤子结果发现两条裤腿的颜色不一样。

边远的小镇的同志似乎“洞察”了他的心理，

所以他刚到大城市不久就接连收到了来自小镇的电报，催他快点去讨个结果。反正我也不是为了个人。反正我从来也没坐过那辆上海牌，今后也不会坐。他鼓励着自己，经过了街灯如川的大路，离开了明亮如舞台的终点站和热情的乘客，绕来绕去，掉到沟里又爬出来，一身土，一脚泥，来到了。

终于从两个孩子嘴里证明了楼号和门号的无误，然后他快步走到了四楼，找对了门，先平静了一下，调匀呼吸，然后尽可能轻柔地、文明地然而又是足够响亮地敲响了门。

没有动静，然而门内似乎有点声音传出来，他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好象有音乐，于是他摒弃了方才刹那间“哟，没在家”的既丧气而又庆幸的侥幸心理，坚决地再把门敲了一次。

三次敲门之后，咚咚咚传来了脚步声，吱扭，旋转暗锁，光当，门打开了，是一个头发蓬乱的小伙子，上身光光的，大腿光光的，浑身上下只有一条白布裤衩和一双海棉拖鞋，他的肌肉和皮肤闪着光。“找谁？”他问，口气里有一些不耐烦。

“我找×××同志”，陈果按照信封上的名字说道。

“他不在”，小伙子转身就要关门，陈果向前迈了一步，用这个大城市的最标准的口语发音和最礼貌的词句作了自我介绍，然后问道：“您是不是×××同志家里的人，（估计是×××的儿子，

其实对这样一个晚辈完全不必用‘您’）您能不能听我说一说我的事情并转达给×××同志？”

黑暗里看不到小伙子的表情，但凭直觉可以感到他皱了皱一下眉，迟疑了一下，“来吧”，他转身就走，并不招呼客人，那样子好象通知病人去拔牙的口腔医院的护士。

陈果跟着他走去。小伙子的脚步声——咚、咚、咚。陈果脚步声——嚓、嚓、嚓。黑咕洞洞的过道。左一个门，右一个门，过了好几个门。一个门里原来还有那么多门。有一个门被拉开了，柔和的光线，柔媚的歌声，柔热的酒气传了出来。

钢丝床、杏黄色的绸面被子，没有叠起来，堆在那里，好象倒置的一个大烧麦。落地式台灯，金属支柱发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亮光。床头柜的柜门半开，露出了门边上的弹珠。边远的小镇有好多好友托付陈果给他们代买弹珠，但是没有买着。那里，做大立柜的高潮方兴未艾。再移动一下眼光，藤椅和躺椅，圆桌，桌布就是样板戏《红灯记》第四场鸠山的客厅里铺过的那一张。四个喇叭的袖珍录音机，进口货。香港歌星的歌声，声音软，吐字硬，舌头大，嗓子细。听起来总叫人禁不住一笑。如果把这条录音带拿到边远的小镇放一放，也许比入侵一个骑兵团还要怕人。只有床头柜上的一个装着半杯水的玻璃杯使陈果觉得熟悉，亲切，看到这个玻璃杯，就象在异乡

的陌生人中发现了老相识。甚至是相交不深或者曾有介蒂的人，在那种场合都会变成好朋友。

陈果发现门前有一个破方凳，便搬过来，自己坐下了。他身上脏。他开始叙述自己的来意，说两句又等一等，希望小伙子把录音机的声音关小一些，等了几次发现没有关小的意思，便径自说下去。奇怪，一向不算善于谈话的陈果好象被人偷去了嘴巴，他说得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有些词用得不伦不类，比如本来是要说“想请×××同志帮助给联系一下”，竟说成了“请您多照顾”，好象是他来向这个小伙子申请补助费。本来是要说：“我先来联系一下”，竟说成了“我来联络联络”。而且连说话的声音也变了，好象不是他自己的声音，而是一把钝锯在锯榆木。

说完，他把信掏了出来，小伙子斜仰着坐在躺椅上一动也不动，年龄大概有小伙子的两倍的陈果只好走过去把边远地区领导同志的亲笔信送了过去。顺便，他看清了小伙子那张充满了厌倦和愚蠢的自负的脸。一脸的粉刺和青春疙瘩。

小伙子打开信，略略一看，非常轻蔑地笑了一下，左脚却随着软硬软硬的歌声打起拍子来。录音机和香港“歌星”的歌声，对于陈果来说也还是新事物，他并不讨厌或者反对这种唱法，但他也不认为这种唱法有多大意思，他的脸上也出现了一个轻蔑

的笑容，不自觉的。

“这个×××”，（说的是边远地区的那位领导）“是我爸爸的战友吗？”（按，到现在为止他没有作自我介绍，从理论上还无法证明他的爸爸是谁）“我怎么没听我爸爸说过？”

这句话给了陈果一种受辱的感觉。“你年轻嘛，你爸爸可能没对你说过……”陈果也不再客气了，回敬了一句。

“我爸爸倒是说过，一找他修车，就都成了他的战友了！”

陈果的脸发烧，心突突地跳起来，额头上沁出了汗珠，“难道你爸爸不认识×××（边远地区的首长）吗？他是一九三六年就到延安去的，去年在《红旗》上还发表过一篇文章……他的哥哥是××军区的司令啊！”

陈果急急忙忙地竟然说起了这样一些报字号的话，特别是当他提到那位知名的大人物、××军区的司令时，刷地一下子，他两眼一阵晕眩而且汗流浹背了。

小伙子的反应是一个二十倍于方才的轻蔑的笑容，而且笑出了声。

陈果无地自容，他低下了头。

“我跟您这么说吧”，小伙子站了起来，一副作总结的架势，“现在办什么事，主要靠两条，一条你得有东西，你们能拿点什么东西来呢？”

“我们，我们有什么呢？”陈果问着自己，“我们有……羊腿……”他自言自语地说。

“羊腿不行”，小伙子又笑了，由于轻蔑过度，变成了怜悯了，“再一条，干脆说实话，就靠招摇撞骗……何必非找我爸爸呢，如果你们有东西，又有会办事的人，该用谁的名义就用去好了。”然后，他又补了一句，“我爸爸到北戴河出差去了……”他没有说“疗养”。

陈果昏昏然，临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忽然停下了脚，不由得侧起了耳朵，录音机里放送的是真正的音乐，匈牙利作曲家韦哈的《舞会圆舞曲》。一片树叶在旋转，飞旋在三面是雪山的一个高山湖泊的碧蓝碧蓝的水面上，他们的那个边远的小镇，就在高山湖泊的那边。一只野天鹅，栖息在湖面上了。

黑洞洞的楼道。陈果

象喝醉了一样地连跑带跳地冲了下来。咚咚咚咚，不知道是他的脚步声还是他的心声更象一面鼓；一出楼门，抬头，天啊，那个小小的问号或者惊叹号一样的暗淡的灯泡忽然变红了，好象是魔鬼的眼睛。

多么可怕的眼睛，它能使鸟变成鼠，马变成虫。陈果连跑带蹿，毫不费力地从土沟前一跃而过，球赛结束了，电视广播员用温柔而亲切的声音预报第二天的天气。他飞快地来到了公共汽车的终点——起点站。等车的人仍然是那么多。有一群青年女工是去工厂上夜班的，她们正在七嘴八舌地讨论车间的评奖。有一对青年男女，甚至在等车的时候也互相拉着手，扳着腰

枝。今日的四铭先生看了准保又要休克了。陈果上了车，站在门边。这个售票员已经不年轻了，她的身体是那样单薄，隔着衬衫好象可以看到她的突出的、硬硬的肩胛骨。二十年的坎坷，二十年的改造，陈果学会了许多宝贵的东西，也丢失了一点本来绝对不应该丢失的东西。然而他仍然爱灯光，爱上夜班的工人，爱民主、评奖、羊腿……铃声响了，“哧”地一声又一声，三个门分别关上了，树影和灯影开始后退了，“有没有票的没有？”售票员问了一句，不等陈果掏出零钱，“叭”地一声把票灯关熄了。她以为，乘车的都是有月票的夜班工人呢。

不少读者对晚报发表的评价王蒙创作手法的文章很感兴趣，并希望知道王蒙近期主要作品的发表情况。现简介如下：
《布礼》（《当代》第8期），《悠悠寸草心》（《上海文学》1979年第7



王蒙主要近作发表情况

期），《夜的眼》（1979年10月21日《光明日报》第4版），《说客盈门》（1980年1月12日《人民日报》第5版），《风筝飘带》（《北京文艺》

1980年第5期），《春之声》（《人民文学》1980年第5期），《海的梦》（《上海文学》1980年第6期），《蝴蝶》（《十月》1980年第4期）。

布 礼

· 王 蒙 ·

—
一九五七年，八月

奇热的天气。P城气象台预报说，这一天的最高气温是摄氏三十九度。这是一个发烧、看急诊的温度，一个头疼、头晕、嘴唇干裂、食欲减退、舌苔变黄而又畏寒发抖、颜面青白、嘴唇褐紫、捂上双层棉被也暖和不过来的温度。你摸一摸桌子、墙壁、床栏杆，温吞吞的。你摸一摸石头和铁器，烫手。你摸一摸自己的身体，冰凉。钟亦成的心，更冷。

这是怎么回事？忽然，一下子就冻结了。花草、天空、空气、报纸、笑声和每一个人的脸孔，突然一下子都硬了起来。世界一下子降到了太空温度——绝对零度了吗？天空象青色的铁板，花草象杂乱的石头，空气液化以后结成了坚硬的冰块，报纸杀气腾腾，笑声陡地消失，脸孔上全是冷气。心，失去血色，硬梆梆的了。

事情是从七月一日开始的。七月一日，多么美好，多么庄严，多么令人热血沸腾的

日子！在这一天以前，中共P城市中心城区委员会的青年干部、办公室调查研究组的组长钟亦成，正象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一样，积极热情，慷慨激昂，毫无保留地参加着反右派斗争，他还是办公室领导运动的三人小组的成员呢。然而，七月一日，首都出版的一家报纸上，刊登了一位文艺评论界的新星写的批判文章，这篇文章批判了钟亦成发表在一个小小的儿童画报上的一首小诗。小诗的题目是《冬小麦自述》，拢共不过四句：

野菊花谢了，
我们生长起来；
冰雪复盖着大地，
我们孕育着丰收。

可怜的钟亦成，他爱上了诗。（有人说，写诗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不论拜伦还是雪莱，普希金还是马雅可夫斯基，不是决斗中被杀就是自杀，要不也得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而坐牢。）他读了，背诵了那么多诗，他流着泪，熬着夜，哭着、笑着、叨念着、喊叫着、低语着写了那么多，那么多诗，就是这首《冬小麦自述》也写了那么多、那么多行，最后

被不知是哪一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近视度数很深的编辑全给砍掉了。截至这时为止，钟亦成发表出来的诗只有这四句，而且是配在一幅乡村风景画的右下角。然而这也光荣，这也幸福，这是大地的一幅生生不已的画面，抖擞的小黄菊花，漫天遍地的白雪，翠绿如毡的麦苗和沉甸甸的麦穗……这四句也蓄积着他的许多爱，许多遐想。他在对千千万万的儿童说话。读了他的诗，一个穿着小海军服的胖小子问他的妈妈：“什么叫小麦？小麦比大麦小多少？”“我的孩子，小的不见得比大的小啊，你明白吗？”烫头发的、含笑的妈妈说，她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词句。还有一个梳着小辫子的小姑娘，读了他的四句诗，她就想到农村去，想看一看田野、庄稼、农民、代谢迭替着的作物，还有磨坊，小麦在那里变成了雪白的面粉……多么幸福，多么光荣！

然而它受到了评论新星的批评。那是一颗新星，正在红得透紫。评论文章的题目是：《他在自述些什么》。新星说，这首诗发表在五七年五月，正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刻，他们叫嚣要共产党“下台”，“让位”，“杀共产党”，他们用各种形式，包括写诗的形式发泄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刻骨仇恨，变天的梦想，反攻倒算的渴望。因此，对于《冬小麦自述》这首诗，必须从政治斗争的全局加以分析，切不可掉以轻心，被披着羊皮的豺狼、化妆作美女的毒蛇所蒙骗。“野菊花谢了”，这就是说要共产党下台，称共产党为“野”，实质上与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污蔑我们党毁灭文化遥相呼应。“我们生长起来”，则是说资产阶级顽固派即右派要上台，“我们”就是章罗联盟，就是黄世仁和穆仁智，蒋介石和宋美龄。“冰雪复盖着大地”，表达了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阴暗、极端仇视、极端恐惧的即将灭亡的反动阶级的心理，切齿之声，清晰可闻，而且作者的影射

还不限于此，“我们孕育着丰收”，其实是号召公开举行反革命叛乱。

载着这篇文章的报纸下午才运到P城，临下班以前来到了中心城区委员会。文章象炸弹一样地爆炸了，有的人惊奇，有的人害怕，有的人发愁，有的人兴奋。钟亦成只看了几句，轰地一声，左一个嘴巴，右一个嘴巴，脸儿烫烫地发起烧来了，评论新星扭住了他的胳膊，正在叭、叭、叭、叭左右开弓地扇他的嘴巴。你怎么不问问我是什么人呢？怎么不了解了解我的政治历史和现实表现，就把我说成了这个样子呢？钟亦成想抗议，但是他发不出声音，新星已经扼住他的脖子。新星的原则性是那么强，提问题提得那么尖锐、大胆、高超，立论是那么势如破竹，不可阻挡，指责是那样严重，那样骇人听闻，具有一种摧毁一切防线的强大火力，具有一种不容讨论的性质。文艺批评是可以提出异议的，政治判决，而且是军事法庭似的从政治上处以死刑的判决，却只能立即执行，就地正法。

然而他不能接受，他非抗议不可。一辆汽车横冲直撞，开上了人行道，开进了百货商场。一个强盗大白天执斧行凶，强奸幼女；挖一个三十米深的大坑，把一座大楼推倒在坑里；抱起一台重机枪，到小学课堂里扫射。即使发生了这样的事，也不见得比这篇批判文章更令钟亦成吃惊。白纸黑字，红口白牙，我们自己的报纸上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弥天大谎？所有的那些吓死人的分析，分析的是他和他的小小的诗篇吗？他听见了自己的骨渣声，那位评论新星正把他卷巴卷巴放到嘴里，正在用门齿、犬齿和白齿把他嚼得咯吱咯吱作响。

他去找区委书记老魏，老魏的家就在区委委会的后院，老魏的妻子就在这个区工作，但是老魏多数情况下仍然住在办公室。灯光下，老魏拿过了那张报纸，越看，眉头就皱得越紧，没有听完钟亦成的激动的申辩，他

说：“你这个同志呀，不要紧张嘛，要沉得住气嘛，要经得起考验嘛。好好工作！有什么想法，可以谈嘛。”

区委书记的话，主要是区委书记的态度，使他安心多了。但当他从走廊走过的时候，无意中看到办公室主任、三人小组组长宋明正在认真阅读评论新星的文章，手捏着红铅笔，圈圈点点。宋明同志，不知为什么一想起他来就有点发怵。宋明长着一副小小的却是老人一样的多纹络的面孔，戴着一副小小的、儿童用品一样的眼镜，最近刚与老婆离了婚，从早到晚板着脸孔，除去报刊和文件上的名词他似乎不会别的语言。给钟亦成印象最深的是一年以前，钟亦成曾经发现，在宋明的工作台历上，和密密麻麻的“催××简报”、“报××数字”、“答复××询问事项”、“提××名单”等事项并列的还有“与淑琴共看电影并谈话”（淑琴是他妻子的名字，当然，那时候他们还没有离婚）以及“找阿熊谈说谎事”（阿熊是他的儿子的名字，现年六岁）。现在，评论新星的文章引起了宋明的注意，肯定，他的工作台历上将要出现新的项目，如“考虑钟亦成《自述》一诗”之类，这令人未免发毛。

钟亦成找了自己的恋人凌雪。凌雪说：“这简直是胡扣帽子！是赤裸裸的陷害和诽谤，是胡说八道！”又说：“也不能他说什么就算什么啊，不用理他！别发愁，劳驾，走，咱们上街喝一杯冷牛奶！”

凌雪的话使钟亦成的心活动了些，抬起头，天没有塌下来，跺跺脚，地没有陷下去。钟亦成还是钟亦成，爱情还是爱情，区委会还是区委会。但他觉得凌雪把问题看得简单了，她怎么体会不到，“新星”的咄咄逼人的架式和语言后面，隐藏着多么巨大的危险！

什么危险？他不敢想。他可以想象自己生命的终止，可以想象太阳系的衰老和消亡，却不能想象这危险。但他从七月一日这

一天产生了一种如此令人懊恼又令人羞辱的心理：他非常注意旁人对他的态度，注意别人的眼和脸。可能是他神经过敏，也可能确是事实，他觉得绝大多数人在这一天以后程度不同地对他改变了态度——他知道，这是“新星”的文章的效应。有人见了习惯地一笑，但笑容还未完全显露出来就被撤销了，脸部肌肉的这种古怪的运动可真叫人难受！有人见了照例伸出了手，匆匆地一握——眼睛却看着别处。有些特别熟悉的同志，见了他不好不说几句话，但说的话颠三倒四，显然是心不在焉。只有宋明，见了他以后态度似乎比往日更好一些，宋明的彬彬有礼和从容不迫后面包含着一种自负，一种满足，却绝没有虚伪。

八月，形势急转直下。先是上级批评了这个区的反右运动，说是这里的运动有三多三少：声讨社会上的右派多，揪出本单位的右派少；揪出来的人当中留用人员多，混在革命队伍内部的、特别是党内的少；基层里揪出来的多，区委领导机关里揪出来的少。接着宋明在各种会议上发动了攻势，并贴出了大字报，指出这里的运动所以迟迟打不开局面，是由于老魏手软，温情，领导人本身就右倾，还能搞好反右派斗争吗？例如，首都某报纸已经对钟亦成的反党诗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区委这里却按兵不动，甚至还让钟亦成继续混在办公室的三人小组之中，这难道不能说明老魏在政治上已经堕落到了何种地步了吗？果然，在上级和宋明的夹攻之中，老魏作了一次又一次的检讨，钟亦成也被“调”出了“三人小组”。紧跟着，各部门的运动进入了新阶段，呼啦呼啦地揪出了许多人。揭发钟亦成的大字报一张又一张地出现了。真奇怪，一个好好的人只要一揭就会浑身都是疮疤。钟亦成曾经嘲笑过某个领导同志讲话罗嗦，钟亦成曾经说过许多文件、简报、材料无用，钟亦成曾经说过我们的党群关系有问题，……越揭越多，使钟亦成自己也完全

懵了。终于，在奇热的这一天，他被叫去谈话，和他谈话的主要领导人是宋明，老魏也在场。

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新阶段，而一切连续性，中断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

红袖章的火焰燃烧着炽热的年轻的心。响彻云霄的语录歌声激励着孩子们去战斗。冲呀冲，打呀打，砸烂呀砸烂，红了眼睛去建立一个红彤彤的世界，却还不知道对手是谁。

但是有标签。根据标签，钟亦成被审问道：

“说，你是怎么仇恨共产党的？你是怎样梦想夺去你失去的天堂的？”

“说，你过去干过哪些反革命勾当，今后准备怎样推翻共产党？”

“说，你保留着哪些变天账，你是不是希望蒋介石打回来，你好报仇雪恨，杀共产党？”

集体念语录：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

飏，一皮带，嗡，一链条，喔噢，一声惨叫。

“说，说，说！”

“我热爱党！”

“放屁！你怎么会热爱党？你怎么可能热爱党？你怎么敢说你热爱党？你怎么配说你热爱党？你这是顽固到底！你这是花岗岩脑袋！你这是向党挑战！你这是不肯认输，不肯服罪！你这是猖狂反扑！我们就是要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

飏和嗡，皮带和链条，火和冰，血和盐。钟亦成失去了知觉，在快要失去知觉的一刹那，他看到了那永远新鲜、永远生动、永远神圣而且并不遥远的一切。

二

一九四九年一月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一日，人民解放军向P城发动了总攻击。两天之后，P城党的地下市委通知各秘密支部：决定性的时刻已经到来，为了防止国民党军灭亡前的疯狂破坏，防止地痞流氓、社会渣滓利用新旧历史篇章迭替中可能出现的空白页进行抢劫和其他犯罪活动，各支部要按照近两个月来反复研究和制定了的迎接解放的部署，立即付诸行动。

P城省立第一高中的学生、三个平行支部之一的支部书记、入党已经两年半的十七岁的候补党员钟亦成，在接到上级联系人的通知以后，打破秘密工作的常规，连夜把他所联系的四名党员（其中有一名是年逾五十的数学教师）、十三名盟员召集到一间早已弃置不用的锅炉房地下室里，在闪烁着微弱的光焰的蜡烛照明之下（发电厂早就不发电了），传达了上级的指示，然后用短促有力的话语为这十七个人分配了任务。十七个人第一次聚在一起，为党员和盟员队伍的壮大兴旺而欢欣鼓舞，为有钟亦成这样干练、这样聪明、这样富有忘我精神的指挥员而感到放心和自豪。回到宿舍，正是午夜沉沉的时刻，他们叫醒了北斋所有的住校生，钟亦成说道：

“同学们，现在，解放大军已经攻进了城，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就要结束了！中国的几千年的人吃人的历史就要结束了！天亮了！繁荣、富强、自由、平等、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就要诞生了！根据华北学联的要求，我们要组织护校、护城，防止破坏，保护国家名胜古迹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凡愿意参加的，到这边来领袖标……”

钟亦成亮出了早已准备好了的学联的旗帜和袖标，同学们各自的脸上分别呈现出了

惊喜、诧异、迷惘、恐惧的表情。学生当中本来还有少数的特务分子和从解放区逃出来的反动地富的子弟，他们已在前不久被“剿总”招到“自救先锋队”里，准备和共产党决一死战去了。这样，学生宿舍里剩下的大多还是比较正派的学生。很快，在秘密党员和盟员的带动之下，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是新时代的主人，新社会的先锋！”等豪言壮语的鼓动之下，除了少数几个嘴唇哆嗦的胆小鬼以外，大多数同学都响应了号召，他们佩戴上了红袖标，他们撬开了体育室的门（学校行政负责人已经不知去向），每人拿了一根“童子军”军棍作武器，列队向校外走去。至于那位党员教师，他以教联的名义组织在校的教职员工护校。

天色微明了，冷风料峭，炮声停止了，枪声还在时紧时慢地鸣响着，有远处传来的炒豆般的劈劈拍拍的声音，也有近处子弹划破空气所发出的尖厉的“啾”“啾”声，四处充满了硝烟的气味。街道上阒无一人。所有的商店都关紧了门窗，上着厚重的木板。日常行驶在大街上的仅余的几辆破破烂烂、叮咛作响的有轨电车和改装烧木柴的、烟气刺鼻的公共汽车根本没有出场，洋车（黄包车）、三轮和排子车也失去了踪迹。连在这个一切都日渐紧缩和衰败的城市唯一急速膨胀、扩大着的乞丐队伍也不知道收缩到哪里去了。只有街头堆置的、散发着刺鼻的腐臭气味的、五颜六色的垃圾，使你能以想起这个城市的居民，想到他们的正在腐烂、正在死亡、正在沉沦、正在蜕变和正在新生的生活。

钟亦成带领着一个由三十多个年轻的中学生组成的队伍走过来了。他们当中，最大的二十一岁，最小的十四岁，平均年龄不到十八岁。他们穿得破破烂烂，冻得鼻尖和耳梢通红，但是他们的面孔严肃而又兴奋，天真、好奇而又英勇、庄重。他们挺着胸膛，迈着小步，目光炯炯有神，心里充满着只有亲手去推动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车轮的人

才体会得到的那种自豪感。

路是我们开哟，
树是我们栽哟，
摩天楼是我们亲手造起来哟，
好汉子当大无畏，
运着铁腕去消灭旧世界，
创造新世界哟，创造新世界哟！

钟亦成的耳边似乎响起了他最喜爱的这首歌的雄强有力的合唱。“跟紧！”“站齐！”“向左转！”钟亦成神态凛然地指挥着队伍，向他们负责保卫的金波河石桥进发。在接近这座古老的、成为联结河东河西两岸的交通要冲的石桥的时候，从十字路口的南侧，又出现了一支由女中的学生组成的队伍，她们衣着朴素，面黄肌瘦，好像生在贫瘠干旱的山坡的树苗一样长得都不怎么舒展，但一个个也是神采奕奕，动作迅速而且整齐，俨然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女兵队伍。钟亦成立即认出了带队的女孩子——凌雪。

凌雪是私立静贞女中初三的学生，圆脸，窄额头，短发，长着一双目光非常沉稳和善的眼睛，一个端正、秀美、光泽和神气的鼻子，一张总是带着笑意的、却又常常是闭得紧紧的嘴。一九四七年，在五个大学的学生自治会联合举办的反内战、反饥饿营火晚会上，一九四八年抗议伪参议会主使屠杀东北流亡学生的游行中，以及后来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举办的一些电影晚会上，他们见过几次面而且交谈过。今天，在这个历史转折的时刻，在即将属于人民所有的城市的街头邂逅，而且各自带着一支队伍——这说明了他们的即将公开的政治身份，两个人脸上都显出了明朗的、会心的笑容，一种比爹娘、比兄弟姐妹还亲的革命感情暖热了他们的心胸。“天亮了！”钟亦成向凌雪扬起手，喊道。

凌雪正要回答钟亦成的招呼，一阵枪声传来，沿着干涸了的旧河道，仓皇逃过来两个国民党败兵，有一个显然是腿部负了伤，

绿裹腿被血迹染得殷红，一跛一拐。另一个是个大个子，满脸络腮胡子，手里端着步枪，像个凶神。钟亦成连思索都没思索，大喝一声“站住！”就从两米高的桥端向着这个大个子扑了过去，他和大个子一起摔倒在地上，他闻到了大个子身上的哈喇和霉锈的气味，他举起了“童子军”军棍，又喝了一声：“缴枪，举起手来！”这时，男学生和女学生也都冲了过来，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两个国民党败兵慌忙举起了手，那个跛子还跪到了地上。败兵们根本没有分析他们的对手的实力，他们没有想到抵抗也无法抵抗，正象年轻的孩子们没有想到危险也并不存在危险，革命正在胜利，他们也正在胜利，就连从两米高蹿下来的钟亦成，不但没有摔坏，甚至也没有磕碰着一块皮肤。“押到那边去！”他下令说，象战场上的指挥员。“祝贺你！一来就成功了。”凌雪笑着走过来，象大人那样地与钟亦成握了一下手，然后集合起自己的队伍，转身前进了。

“你们负责哪里？”望着女学生们的背影，钟亦成发问说。

“鼓楼。”凌雪回过头来，答道，她又高高举起右手，向钟亦成挥了一挥，她喊道：

“致以布礼！”

什么？布礼？这就是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康姆尼斯特——共产党人的敬礼！钟亦成听说过，在解放区，在党的组织和机关之间来往公文的时候，有时候人们用这两个字相互致意，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还是头一次从一个活着的人，一个和他一样年轻的好同志口里听到它。这真是烈火狂飚一样的名词，神圣而又令人满怀喜悦的问候。布礼！布礼！黄钟大吕般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一九六六年六月

他苏醒过来了。

他看见了戴红袖章的青年们。绿军装，宽皮带，羊角一样的小辫子，半挽起来的衣袖……他们有多大年纪？和我在一九四九年一样，同样是十七岁吧？十七岁，这真是一个革命的年岁！一个戴袖标的年岁！除了懦夫、白痴和不可救药的寄生虫，哪一个十七岁的青年不想用炸弹和雷管去炸掉旧生活的基础，不想用鲜红的旗帜、火热的诗篇和袖标去建立一个光明的、正义的、摆脱了一切历史的污垢和人类的弱点的新世界呢？哪一个不想移山倒海，扭转乾坤，在一个早上消灭所有的自私、虚伪和不义呢？十七岁，多么激烈、多么纯真、多么可爱的年龄！在人类历史的永恒的前进运动中，十七岁的青年人是一支多么重要的大军呀！如果没有十七岁的青年人，就不会有进化，不会有发展，更不会有革命。

“亲爱的革命小将们！”他喃喃地说。

“放屁！你竟敢拉拢我们，快闭住你的狗嘴！”

又是一阵疼痛和晕眩。为什么这样灼热呢，难道他们点起了一把火，把他投到火焰里？难道在他身上浇了汽油，要点燃他的身体？他们那样热情，那样富有献身精神，那样相信革命的号令，他们本来可以作多少事情！

“致以布礼！”再一次失去知觉的时候，钟亦成突然这样喊了一句，带血的嘴角上现出了发自内心的笑意。

“什么？他说什么？置之不理？他不理谁？他这条癞皮狗敢不理谁？”

“不，不，我听他说的是之宜倍勒喜，这大概是日语，是不是接头的暗号？他是不是日本特务？”

“报告，他醒不过来了。他是不是——死了？”

“不要慌。一个敌人。一条癞皮狗。革命无罪，造反有理！”